

曾国藩与容闳

○黄明同

洋务派的开山祖曾国藩与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一流大学学位的容闳，曾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容闳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详尽记述此事。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容闳是非常器重的，而容闳也尽力佐助曾国藩，使其所办洋务取得实效。曾、容二人的相识，固属偶然，但他们的结合，却在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史上写下了值得注意的一页。本文拟就此进行一些探索。

(一)

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人。当时，广东与西方商业、文化交往甚密，“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容闳的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①故送他进英教士开设的“西塾”，接受西方教育，后又得到美国传教士的帮助，赴美深造，成为最早的中国留美学生之一。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四年(1854)，他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并获得学位。经过这番学习，容宏“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②。

咸丰五年(1855)容闳抱着“维新中国之目的”，回到了祖国。他“谋食亦谋道”，欲“于社会中得一职守”③以实现自己的“规划”。④他当过译员、公务员，也从过商。他期求“一旦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从而达到“谋中国的幸福”⑤的目的。然而，他屡易其职，仍一筹莫展。正当他从商而又对“魂梦不忘之教育计划”未得实现这一件事感到苦恼之时，由于张世贵的穿针引线，被曾国藩召见，并委以重任，从此弃商而从政。

曾国藩与容闳的结交，并非一厢情愿，而是两厢情愿。曾国藩为了办洋务，积极地网罗人才，其所网罗者，已“不下二百人”。容闳的到来，正适应他的需要；而对于容闳来说，他结识曾国藩，可说是他人生的大转折。他自称“予之教育计划”，“卒赖曾公力为提倡，乃得实行”，并且“又因予之教育计划告成，而中西学术，萃于一堂”。⑥可见容闳对曾国藩是最敬仰而不可忘怀的。

容闳不但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之军事家及政治家”，⑦而且用“正直、廉洁、忠诚”六字概括其品德，钦佩他握七八省之权，“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⑧容闳赞扬曾国藩“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之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⑨因他“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故“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⑩

《西学东渐记》所记载的曾国藩，是一个异乎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形象。这样，人们就必然产生以此与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藩进行比较的兴趣。我想，倘若以已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为纵坐标，以《西学东渐记》为横坐标，人们在坐标上看到的将是一条曲线：历史上真实的曾国藩，恐非如容闳所说的那么完美无缺，也非近代史教科书所说的一无是处。出身寒士之家又处于历史大转折点上的曾国藩，是复杂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如果用A就是A的方法去研究，则难以奏效。尊重史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承认，《西学东渐记》是一部回忆录，并非文学作品，作者容闳笔下的曾国藩绝非虚构，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却有失于主观偏袒之处。一个历史人物，必有其基本方面，看他是否顺乎历史发展而活跃于社会，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在历史进程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我觉得曾国藩所以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首先是由于他组织湘军，又联合淮军与洋人，去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又曾任钦差大臣，率军进攻捻军，失败而还）。太平天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震撼中外的农民战争，它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以新的生产方式去代替已经成为生产力桎梏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然而，它毕竟大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正如容闳所说：太平军战争“历时至十五年之久”，“此十五年中，满洲政府几无日不处于飘摇风雨之中”，^⑪“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惊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⑫。这场如火如荼的农民战争，终于为曾国藩所镇压。曾国藩视太平军、捻军为“盗贼”，为“匪”，为洪水猛兽，就这点上说，曾国藩受到后人唾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对曾国藩倍加赞颂，无一贬词，实为偏见。偏见的产生，其原因有二：一是容闳得到曾国藩的重用，感恩戴德，并对曾之人格，过分崇敬；二是曾、容二人具有以保“大清”为忠、反“大清”为叛逆的共同的是非标准。容闳笔下所记述的曾国藩，虽有片面性，但也有不失真实性之处。我们抹去容闳加于曾国藩的过于褒美之词，而稽考其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可以认识到，曾国藩并不是一无可取的；证以曾国藩写的“家书”，我认为容闳对曾之某些肯定，并非虚构。曾国藩自统领湘军之后，“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⑬。他屡次告诫家人：“家门太盛，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人人须记此二语”^⑭，应“不失寒士之家风”^⑮，“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⑯，他“不肯多寄银物回家”，“恐家中奢靡太惯，享受太过”^⑰。他下决心不为后代买田置屋，他说“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⑱，他也不准备“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添买”。^⑲他认为“福不可尽享”就是“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⑳，他批评其弟居家“用费甚奢，务宜收啬”，说“累世俭朴之风，不可尽改”^㉑，又批评家里人常坐四抬大轿，他以为坐四抬大轿太奢华，“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晚辈坐，断不可”^㉒。他对其子修屋花钱太多，其弟“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十分不满。^㉓他耽心其弟“能勤而不能俭”，“子侄看大眼吃大口”，家风“后来恐难挽回”^㉔。他不仅自己以“廉、谦、劳”为座右铭，还要求家人时时不忘。从曾国藩一百一十万字的家书看，他不仅相当清廉、勤俭，而且比较耿直、敢说真话，办事非常认真，讲求实效。

古往今来，“正直”与“廉洁”，一直是受到人们称誉的美德，但是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为官不贪者太少，而贪官的中饱私囊，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曾国藩所生活

的年代，正如容闳所说：“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他们从事每一政治活动，皆“欲饱其贪囊”^{②5}。然而，曾国藩却与这些人不同，他能够清廉自律不以权谋私，这在当时实不可多得，远非李鸿章等所能比拟。

容闳虽高度赞美曾国藩，但并未将其视为天赋美德的圣贤，他说：“文正将才，殆非由于天生，而为经验所养成者。”^{②6}曾国藩也认为人之所以能具有的优良品德，乃取决于“变化气质”，“从磨炼后得来”^{②7}。事实上，曾国藩的品德，确非无源之水，而是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成。就廉洁、勤俭来说，由于曾氏家族起于贫寒，世代不离“耕读”，而曾国藩本人在青少年时代曾从事过体力劳动，有机会接触社会下层人民，因而受到劳动群众的美德的熏陶。后来他身居显位，饱阅世态，觉察到世上富贵、贫贱本无定位，“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②8}，“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②9}，“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如果“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③0}。当时，濒于崩溃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使他感到终日战战兢兢，担心自己会被罢官归田，所以他不得不以勤、俭、耕、读四字维系其小康之家族而作为其退路。再从曾国藩的整个品德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深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以为“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③1}。他按照儒家的传统要求进行修养，力求自己的言行符合封建的道德规范，从而进一步去维系封建秩序，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

(二)

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记述了曾国藩支持他办教育的过程。容闳抱着“维新中国”的目的回国，希望干一番大事业。他深感到，当时在中国进行“根本之变革”，乃“不容稍缓之事”^{③2}。他所说的“改革”，是带根本性的一种质变。他清醒地看到，中国具有根本性革新的“革命”实在太少。他指出：“试一翻中国历史”，“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所谓二十四朝，也不过易姓的改朝换代”，因而“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③3}。他寄希望于“革新”，认为“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③4}。

什么是容闳的新政策？从《西学东渐记》所保留的材料看，容闳前后指出过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咸丰十年（1860）访问太平天国首领时向洪仁玕指出的，其具体内容是：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良好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③5}第二方案是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撰拟，以《教育计划》为题，呈江苏巡抚丁日昌转呈清政府，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蓄备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谋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口岸，不

可不建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外力之侵入。……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③容闳的维新计划，着眼于教育，他自称第二方案“陈条之第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③⑦。他在《西学东渐记》自序中说：“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③⑧。可以说，容宏是教育救国论者。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腐败、落后，以至丧权，原因在于中国处在“毫无知识时代”。由于人才缺乏，故在国际交往与商业活动中，常“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③⑨。他还认为，一个人受到良好教育，则“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而在当时，“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④⑩。这就是说，当时中国许多人因没受教育，他们便无知、愚昧，对自身所受的痛苦毫无感觉，故甘心忍受压迫和痛苦。容闳认为只有“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才可以“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④⑪。于是，他致力于教育事业，企图通过其教育计划的实施，“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从而“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④⑫，待到“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④⑬。

显而易见，容闳教育计划的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久处专制压力之下”而产生的顽固、屈从等国民性，代之以“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④⑭，而又由于国民的觉醒、人才的出现，便能进而“自卫”，“完全行使其主权”，能组织军队，能建设良好政府，能由“中国资本家出资入股”兴办矿业、铁路、航运、银行等近代工业、企业，使中国来一个“根本改革”。容闳虽主张效仿西方，但他目睹中国受“欧西各国之干涉”，无法行使自己的主权，感到很愤慨；目睹“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④⑮，他感到很痛心。《西学东渐记》的字里行间，表露出他同西方列强争主权、争平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这一切，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独立、要自主、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与要求。

容闳作为十九世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与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效力的曾国藩，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然而，据《西学东渐记》所载，容闳实施其计划的每一步，却得到了曾国藩的直接支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同治三年(1864)，容闳到安庆曾国藩大营，和曾见面，数日之后，曾又派人召容谈话，询问“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投其所好，暂不提“教育计划”，而大谈建机器厂事。不久，曾即授予他全权，向专门工程师征集意见，并赴美购机器。次年，机器运回上海，建成江南制造局。此乃容闳协助曾国藩办洋务之开始，也是容闳实现其教育计划的前奏曲。由此容闳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信任和提拔。同治六年(1867)容闳乘着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机会，向曾提出办学校的建议。《西学东渐记》记述道：“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觉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

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⑩于是一所新型的工程技术学校就创办起来了,它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近代工业化“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容闳就这样在曾国藩的“赞许”下,迈出了教育救国的第一步。

办兵工学校,对容闳的教育计划来说,只“可谓小试其锋”,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官派学生留洋,让更多的人象他一样,接受新型教育。在他看来,固有的国民性的改变,新的“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的产生,均依赖于一定的教育和环境。他认为,青年学生抵达欧西之后,“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又因“离去故国”,“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作,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⑪。容闳这项建议转呈清政府后,一晃三年过去,秉国钧者仍“不得要领”^⑫。后来幸亏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曾与丁日昌同治九年(1870)联衔入奏,请求清政府采择容闳的陈条^⑬。同年冬,清政府“硃批着照所请”,曾国藩随即驰书召容闳前往商谈,“所商定者凡四事,曰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曰设立预备学校,曰筹定此项留学经费,曰酌定出洋留学年限”^⑭。这样,容闳提出的官派学生出洋留学的建议,终于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实现了。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曾国藩,支持作为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容闳,两个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能密切配合,其必然性是什么?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规定性,但又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从客观事物的各自规定性看,A就是A,但从整体和发展上看,从联系的观点看,事物又常出现A是A,又不是A的状况。曾国藩办洋务,容闳以教育救国,二者质的规定性不一样,然而,二者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事物之间的联系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办洋务与教育救国二者相互联系的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从容闳方面看,他希望以“少年的新中国”代替“老大帝国”,希望中国在“国体和政治上”来一场“根本变革”,而把发展教育作为实现自己愿望的重要途径。他奔走呼号,得不到那些鼠目寸光的清朝统治者的理解和支持。最后,他找到曾国藩作靠山,凭借曾的政治势力,推行其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代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必然要求对老大的封建帝国进行一番革新。然而,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明智人物,这又表现出他的软弱性和依附性。另一方面,曾国藩办洋务,并依靠容闳等资产阶级人物去进行,同样是历史的必然性。清朝自鸦片战争之后,各种社会矛盾都已激化,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使堂堂的东方文明古国陷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而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更使清朝统治者无力对付。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头脑较清醒的人物,看到了外国“船坚炮利”的威力,企图兴办洋务,制造船舰枪炮,去挽救危亡中的封建王朝。他们以为有了“利器”就能“自强”。可见办洋务,是中国官僚们在绝境中所寻到的唯一出路。应该承认,曾国藩办洋务不光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还包含着谋求社会进步、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的意图,这便是曾国藩自己所说:“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⑮正由于这样,所以曾、容二人才有共同语言。这是他们所以能合作的前提和思想基础。他们相互需要,相互利用。就是说,容闳只有靠曾国藩的支持,才能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愿望;而曾国藩办洋务,也只有得到容闳这 (下转89页)

卷、《诗义标准》114卷。关于乡邦文献刊印了李谟《寿梅山房诗存》1卷、丁蓉绶《磨绮室诗存》1卷、《毛贵铭诗钞》3卷、周寿昌《思益堂诗文集》19卷、欧阳翰《硃东诗钞》2卷、毛国翰《青垣诗钞》3卷、郭嵩焘《养知书屋集》55卷、吴敏树《梓湖文集》12卷、李楨《畹兰室文集》4卷、苏舆《春秋繁露义证》17卷。这些刻本，版式清秀，文字精美，同时由于王氏自己亲自校阅，故差错极少。这说明王氏不愧为一位成绩显著的出版家。

王先谦生活于社会矛盾复杂尖锐、外侮日亟，国势危殆的晚清时代，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在前期比较符合时代要求；而在后期，虽然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其总的倾向是保守的。不过，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甚至抹杀他的学术成就和对文化事业的贡献。我觉得由于王氏虚心好学，锲而不舍，充满求实的研究精神，所以他在清末能翼翼独造，成为一代杰出学人。我这一评价，自己认为比较客观，不知学术界以为然否？

（作者工作单位：岳麓书社）

（上接80页）样精通外语和熟悉西欧情况的人佐助，才能事半功倍。可见曾、容二人的结合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应当看到，曾国藩办洋务，其主观愿望并非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他要求学西方的“船坚炮利”，以至办其他近代工业，其宗旨在于给古老的封建帝国对症下药，使它从奄奄将毙中霍然而愈，重新挺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曾、容二人政治目的根本异点。然而，由于容闳的出谋划策兴办洋务，他的关于重视基础工业、开采矿产，修筑铁路、举办航运和派遣留学生以及创办新型学校等建议均被曾国藩采纳，因之，曾国藩办洋务的结果，却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近代工业，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办洋务所引进的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当它们与中国的劳动者相结合和由某些新型人才去管理生产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生产逐渐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化；而曾国藩欲以此去挽救封建王朝的危机，去维系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必然事与愿违。这一切，是曾国藩及其后继者所无法预料的。由此可以看到曾国藩办洋务，其主观愿望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而客观上则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林则徐、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曾国藩得容闳之助而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充分注意的事。曾国藩及其后继者办洋务，虽然因受到阶级局限而未能以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表的姿态出现，但他们敢于正视现实，企图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自强”、“求富”，使中国走向近代化，走向世界，这比起封建营垒中主张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保守派，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曾国藩及其后继者办洋务所带来的积极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历史事实，决不可片面地抓住其阶级局限性不放而完全予以否定。

受过西方教育的容闳，他的思想比曾国藩及其后继者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由于缺乏适合新的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他看到了人的知识素质、文明程度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因而要从教育入手去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但教育制度为政治制度所支配，在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未得到改造以前，容闳要推行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教育制度，并以此救国，乃是一种幻想。

（本文作者：华南师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